

河东记忆

绛州王之涣

□王友明

王之涣是绛州(今新绛县)人,属于太原王氏晋阳支脉,是太原王氏开基始祖王霸的后裔。
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背诵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,那行云流水、舒卷自如、意境深邃、妙理哲思的诗句,一下便把人带进了开阔、广大的境界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调至侯马某部队医院。一天晚上,我同新绛县的战友闲聊时,无意中得知,王之涣就是绛州人。于是,引起了我对他生平的探究兴趣。后来,我淘到一本1980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,王之涣的生平赫然在目:“王之涣,字季凌,原晋阳(今山西太原)人,后迁居绛郡(今山西省新绛县)。王之涣擅长‘歌从军,吟出塞’,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。他和王昌龄、高适等人交谊很深,常以诗歌唱和赠答。因为他的诗‘情致雅畅’‘每有作,乐工辄取以被声律’;所以,许多作品‘传乎乐章,布在人口’,流传很广。可惜这些作品大多失传,《全唐诗》仅录存其诗六首。”我即刻购买到《全唐诗》上、中、下3卷,上卷果真仅录存《登鹳雀楼》《送别》《凉州词二首》《宴词》《九日送别》6首。

怀着对先祖王之涣的景仰之情,我专程到山西师大图书馆,查阅了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唐才子传》,发现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无传,《唐才子传》中所记,也是非常简单。令我感到欣慰的是,唐靳能所作《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》的发现,为世人提供了王之涣的一些详情。其中记载,王之涣“本家晋阳,宦徙绛郡”。在一些谱牒书籍中,我又查阅到,他的五世祖王隆之,为后魏绛州刺史,他们家就是那时迁至绛州的。故,绛州是他的出生地,晋阳是他的祖籍。

侯马与新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,在新绛战友的陪同下,我前往古城绛州,探寻他的点滴踪迹。

按照王之涣的生卒年,我首先探寻了位于新绛县城北街高坡上的



王之涣塑像(资料图)

龙兴寺。龙兴寺,始建于唐,原名碧落观。碧落观改称龙兴寺的第18年,王之涣出生。我想,王之涣小时候一定会经常来此游玩。他走上仕途,因遭人诬陷诽谤,愤然辞官,闲居在家15年,也一定会来此消遣。我在龙兴寺里寻寻觅觅,却未发现他留下只言片语。

站在龙兴寺13级龙兴宝塔旁,我的思绪翻飞。哪个游子不怀乡?王之涣亦然。他身在蜀地为官,与友人于农历九月初九重九登高饮酒时,曾作《九日送别》一诗:“蜀庭萧瑟故人稀,何处登高且送归。今日暂同芳菊酒,明朝应作断蓬飞。”在秋风萧瑟的蜀北,相熟的朋友本来就少,又有谁能登高送我回归故乡呢?今天还能聚在一起同饮芬芳的菊花酒,也许明日你就像这随风漂泊无定的断蓬一样,不知道飞向何方。一种催人泪下的怀乡之情,跃然纸上。

走出龙兴寺,驱车直奔绛守居园池。这座园池,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,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古老的园林之一,其布局设计、建造艺术,在园林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,是中国现存唯一一座隋代园林。这里是当年供州府太守和夫人及州府官员休憩游玩的地方,从这座园池始建,到王之涣出生,中间相隔90余年。园池内,曲径通幽、古朴典雅,亭榭楼阁错落有致,是一处很适合休闲赏景的好地方。这样一座可与苏州园

林相媲美的写意山水园林,曾吸引了无数名流雅士一睹仙境风光。比他出生晚319年的欧阳修到此一游,诗兴大发,遂作一首《绛守居园池》,令这座园池光芒四射。我苦思冥想,王之涣诗名,不但后世万分景仰,即使在世时,都已声震海内,何故也没有为这座园池留下诗句?

2002年金秋,当得知鹳雀楼又巍然耸立于黄河岸畔时,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遂驱车前往。在鹳雀楼内,听导游讲解的、游人吟咏的、专家品评的,还是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。我攀上最高层,沿着回廊,绕楼一周,来到王之涣的塑像处。手扶栏杆,纵目远眺,黄河奔腾,浩瀚无垠的景象,尽收眼底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从《洛阳日报》上看到一则消息《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葬于洛阳》。文章中说,王之涣少年时即聪而好学,“不盈弱冠,则究文章之精;未及壮年,已穷经籍之奥”。因其父为官,王之涣门荫冀州衡水主簿之职,但因他“气高于时,量过于众”而遭人诬陷。王之涣因此拂衣去官,悠游青山,不再做官。他在家15年后,有好友“劝其入仕,久而乃从”,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。做官时,他以清白著称。公元742年,王之涣因病逝于官舍。他这是用生命抒写了一部“清白为官、公平处事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的动人乐章!

(《山西日报》)

人物

北宋第一伯乐

□罗保传

在宋朝历史上,欧阳修推荐了许多真才实学的人,堪称北宋第一伯乐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中,宋代有五人出自他的门下,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提携而名垂青史。

“三苏”能有如此成就,与欧阳修的赏识有很大关系。当年,苏洵带苏轼、苏辙进京应试时,遇见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。欧阳修读了苏洵的《衡论》等文章后赞不绝口,向皇上推荐,苏洵自此走上仕途。后来,苏轼、苏辙兄弟也被欧阳修慧眼识珠。

曾巩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,屡试名落孙山。后来,他借进京赶考的机会,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《上欧阳学士书》,希望欧阳修将其收入门下。欧阳修读完他的文章后非常欣赏,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为了鼓励这位落魄的读书人,欧阳修给曾巩写了一篇《送曾巩秀才序》,后将其收入门下。曾巩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,无论是在中央做官还是在地方为政,都留下了历史美名。

曾巩以文相识王安石,并结为挚友。自登欧阳修门后,曾巩向欧阳修举荐了王安石,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得以入京为官。尽管后来欧阳修与王安石二人政见不合,但其友谊却一如既往。公元1072年,欧阳修去世,王安石知悉后写下祭文,肯定其文学成就,称赞他高风亮节。

除此之外,名臣包拯、政治家韩琦、贤相文彦博、涑水先生司马光,这些风云人物都曾得到过欧阳修的鼓励和推荐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这样评价他:“奖引后进,如恐不及,赏识之下,率为闻人。”(《团结报》)

谈古论今

弦子老铺余韵长

□杨丽娟

“操琴司鼓奏皮黄,字正腔圆韵味香。”国粹京剧的多种伴奏乐器中,胡琴是最主要的。胡琴,也叫京胡,过去在北京,做胡琴、卖胡琴是个专门行当,叫“胡琴铺子”。

胡琴铺子不只卖京胡,“二胡、中胡、高胡、板胡、四胡等,这些拉弦类乐器过去统称‘胡胡儿’,都属于胡琴类。”相关专家王文生先生告诉记者,老百姓管胡琴铺子叫“弦子铺”或“胡胡儿铺”。

北京胡琴铺子的鼻祖是文盛斋弦子老铺,清代咸丰年间就在琉璃厂开店了。店主姓张,河北深县人,膝下只有一独生女儿,女儿嫁人后不幸早年丧夫,便回娘家成了文盛斋的女主人,邻里同行皆以“张寡妇”称之。张寡妇没有文化,但掌管文盛斋后,很快把小小的弦子铺发展成了行业翘楚。鼎盛时期,文盛斋占房15间,前面六间是店面,后院三间上房是店主人自住,其余房间用作库房。

文盛斋的买卖兴盛,还得益于京剧的走红。清末民初,京剧盛极一时,以至“满城争唱叫天儿”(京剧泰斗谭鑫培人称“叫天儿”),文盛斋不仅为清朝宫廷制作乐器,而且吸引了众多票友,铺子的乐器甚至远销四川、云南等地。

民国初年,新的弦子铺纷纷开张。这些新店的老板很多都是文盛斋的学徒,如文兴斋、马良正等。据北京民族乐器厂首任厂长陈韶轩回忆,文兴斋之下又有陈韶轩、杨宝忠、文声斋等,马良正之下又有友联社、施子云、史善朋、公和兴等名号。1956年,北京民族乐器厂成立时,其中一半以上的工人都出自文盛斋一脉。

名号众多的弦子铺大致分布在琉璃厂和打磨厂两个地段。王文生介绍:“琉璃厂的琴铺一般比较高端,多为专业演奏家制琴;打磨厂虽然也有高档琴铺,但以中低档为主,量大,发往全国各地。”为梅兰芳伴奏的天才琴师王少卿的胡琴,就是交给琉璃厂的马良正胡琴铺子攒组起来的。

弦子铺说是铺子,其实像文盛斋那样规模的极少,多数都是小作坊,往往是一间铺面,连掌柜伙计仅两三个人。“伙计”很多都是掌柜的自家兄弟、本家子侄,他们从河北农村到北京,只图学个手艺,讨口饭吃。

1956年,全国手工业推行“公私合营”,胡琴铺子的手艺人都进入了北京民族乐器厂。如今,北京民族乐器厂已发展为国内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企业之一,当年从小作坊里走出的满瑞兴等师傅们,也有不少成了乐迷们熟知的乐器制作大师。(《北京日报》)

名人轶事

范仲淹:掌学应天府 创书院典范

□张恒

宋末元初牟巘《义学记》言:“宋时天下有四书院,应天府书院为首。”在应天府书院成为天下书院典范的历程中,范仲淹居功甚伟。从求学于此到掌学于兹,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书写了相互成就的佳话。

公元1011年,22岁的范仲淹辞别故里淄州长山(今山东邹平),前往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求学应天府书院。这座始于五代后晋的私学,刚于两年前造舍聚书、招生复学,并获赐朝廷匾额。因继父“既加养育,复勤训导”而在少时留下“划粥断齑”“书台夜雨”等苦读佳话的范仲淹,如今更是珍视机会发愤苦读,“昼夜不息,冬月惫甚,以水沃面;食不给,至以糜粥继之,人不能堪,仲淹不苦也”,终至“大通六经”,四年后举进士,开始仕宦生涯。

十年之后,范仲淹再次来到应

天书院,这次他换了身份。公元1026年,范仲淹丁母忧寓居应天,受时任知府晏殊邀请,出掌应天书院。此间所作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(应天府公元1014年升南京,应天书院又称南京书院)集中反映了范仲淹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:教学理念上经、文并重,主张讲义乎经、咏思乎文,经以明道、文以通理;教学内容上博约相济,主张通《易》之神明、得《诗》之风化、洞《春秋》褒贬之法、达礼乐制作之情、善言二帝三王之书、博涉九流百家之说;教学目标上不唯科第,既培养“有忧天下之心”的卿大夫,也培养“能乐古人之道”的乡先生;教学制度上严立规矩,“夜课诸生,读书寝食,皆立时刻”。范仲淹“常宿学中,训督有法度,勤劳恭谨,以身先之”,给学生出题必先作答,以准确把握难易和效果。一时间,求学者云集。书院培养了大批能臣大儒,“宋人以文学有

声名于场屋、朝廷者,多其所教也”。公元1043年,书院升国子监,后屡建屡废。2003年启动原址复建。

掌学应天府书院前后,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不断成熟,这背后是对当时文风、学风、考风、政风之弊的深刻洞察。在公元1025年的《奏上时务书》中,范仲淹针对“修辞者不求大才,明经者不问大旨”等积弊,条陈救文弊、复武举、重科第、革赏延等举措,其在书院倡经以明道、文以通理正对此而言。公元1027年又作《上执政书》,进一步强调慎选举、敦教育,主张考试“先策论以观其大要,次诗赋以观其全才”“先于都督之郡,复其学校之制”。公元1030年又两次上书晏殊,阐述“宗经、劝学、育才、善国”的体系化教育思想,主张培养明经籍之旨、练王霸之术的人才。这些思想后在“庆历新政”中皆有体现。(《学习时报》)